

走出历史的恩怨

评《事实改变之后》

■王延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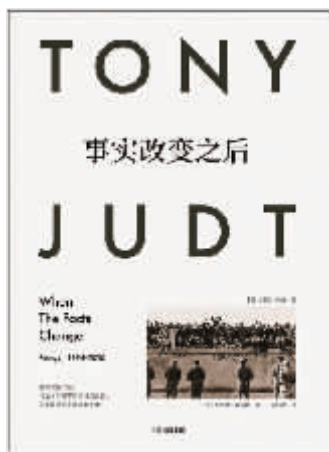
对于欧洲历史，中国读者熟悉的，大多是罗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部分英国君主女王史和“二战”史，至于战后欧洲史，则堪称冷门领域，而这恰恰是托尼·朱特的研究对象，《战后欧洲史》就是他的一部力作。

2010年，这位聚焦欧洲历史未透彻剖析之地的史学大家在家中去世，年仅62岁，令人扼腕。阅读新近出版的朱特作品集《事实改变之后》，发现他除了历史学家的身份，还是一位富于现实思考和批判，极具洞察力的专栏作家。在这本书中，从后冷战时代到犹太人话题，从后“九·一一”时代到生活方式的思考，他都能以一种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又在现实中给予批判的角度，给读者一种时空穿越的独特阅读体验。

本书涉及话题不少，但其核心始终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正在变化的世界，特别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如何摆脱偏激和单边模式下的无法自拔。而在诸多话题的探讨中，第二部分“大屠杀和犹太人”是最具胆识、理性、批判性的。

朱特本人就是犹太人，1948年生于伦敦。同年，以色列建国。作为强国围绕的国家和民族，以色列的“卫国战争”和发展过程充满传奇和坚韧，为很多人所称道。

当然，对以色列国家发展过程的反思也一直在这个民族内部不断涌现。比如以色列专栏作家沙维特的《我的应许之地》，便在感情丰富的以色列国家发展叙事中，体现着反思的力度。与之相比，朱特对自我民族和以色列的批判同样不留情面。他甚至对以色列建国的必要性和思想基础产生怀疑。在他看来，犹太人遭受大屠杀是场悲剧，但犹太民族的民族神话遮蔽了“二战”历史中更需反思的史实和惨痛。他更精辟的论述和观察还在于，以色列以犹太人庇护所、最后守护之地的形象立国，却无形中将全球所有的犹太人“绑架”，于是，以色列沙龙政府时期的粗暴行为便被代换为整个犹太民族需要承受的压力。当以色列政府受到声讨之时，全球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也受到指责和压力，这又成了“反犹”的证据。



《事实改变之后》

[美] 托尼·朱特著
[美] 珍妮弗·霍曼斯编
陶小路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朱特指出，反犹是对犹太人的仇视，以色列则是犹太国家，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犹太人应谨防过度使用“反犹主义”一词。为何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封锁就成了“反犹”，甚至悲情地上溯到纳粹大屠杀？作为犹太人，朱特深刻揭示了这种现象，一些作为其他国家国民的犹太人，在“民族神话”的概念下，被以色列这个国家“捆绑”，这是不正常的，无益于犹太民族在世界的立足和发展。朱特的务实态度是，以对话取代暴力。

从历史现实来看，朱特的判断充满了预见性和深度。他还特别分析了美国在其中的作用。沙龙政府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并未解决冲突问题。在美国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关系进入冰点，巴以问题显得相对沉寂而平衡。特朗普上台后，重启对以色列的强力支持，美国大使馆迁入耶路撒冷之举充满符号意义，却缺乏现实意义。未来走势如何尚待观察，但倘若朱特尚在，此时想必又会“开火”批评吧。

朱特的文章就是具有这样

的特点，逻辑清晰，不留情面，读着痛快，又给你启发。比如对诺曼·戴维斯《欧洲史》的书评中，便对其从常识错误到历史视野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就戴维斯身为东欧、波兰史专家，在一部欧洲史的写作中，过度带入自己研究历史形成的波兰“身份感”而扭曲历史视角的方式提出了批评。其实，在朱特的这本作品集，不管涉及的主题是什么，都体现了他的这种试图打破社会各领域思维固化的疾呼，从学术问题到社会问题，再到外交关系问题，他都试图跳出已有思维圈，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发现新的路径和办法。

正如该书书名所言，“事实改变之后”，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在该书的写作背景下，冷战结束了，巴以冲突加剧了，“九·一一”发生了，你还能抱着过去的想法故步自封吗？朱特告诉我们，不，我们需要调整思路，走入历史深处去追根溯源，进而走出历史恩怨，去开创局面。

朱特的写作风格非常锐利，直击核心，决不是一团和气。正是这样的写作，体现着一位历史学家的思考、勇气和担当。

唤醒心灵深处的幸福

——评玛丽莲·弗伦奇《醒来的女性》

■刘小兵

讴歌女性解放、探讨男女平等的传奇作品《醒来的女性》，系美国著名女作家玛丽莲·弗伦奇的力作。小说出版后，被译成22种文字在全球发行，累计销量达两千万册。

小说讲述小镇女孩米拉的成长和婚姻故事。这位聪颖而独立的小女孩，14岁就开始阅读尼采和潘恩的作品，开学第一天学完全部课本。对于如此优异的学生，学校只得让她跳级。少时的她视知识为朋友，每天不知疲倦地一头扎入书海。母亲却给她灌输传统的持家理念，期望她将来嫁个好人家。一开始，米拉不为所动，但环境的制约，以及当时主流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自身遭逢到几次难言的羞辱和尴尬后，原本追求个性自由的她，在无奈的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了她“高贵”的头颅。

成为人妇之后，她生下两个孩子，也住上了大房子。幸福来得如此迅捷，岂料风云突变，丈夫的出轨给了她沉重一击……离婚后的米拉终于“醒了”：女人，首先要自立和自强，这才是确保婚姻幸福和美满的基础。她再次拿起了久违的书本。虽然，婚姻的变故磨平了米拉性格上的棱角，但也让她在这场突如其



《醒来的女性》

[美] 玛丽莲·弗伦奇著

余莉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来的遭逢里看到了人性的幽微。米拉很快走出了心灵的桎梏，终于在充实的时日中体会到了平凡而琐碎的幸福。

《醒来的女性》以浓墨重彩的笔调，刻画了米拉这一性格鲜明的角色，还以立体浮雕的方式，多层次、多角度地塑造了一群上世纪30年代追求个性独立的女性群像。这些知识女性聪颖好学，头脑灵活，对未来的事业和婚姻曾寄予了很高的期许，但对传统观念和婚姻生活的妥协，又让她们屡屡身心俱疲伤痕累累。玛丽莲以洞悉人性的细微笔触，对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予以

辛辣的嘲讽和犀利的揭示，对倡导女性觉醒、追求男女平等的殷切期盼给予了充分赞许。虽然，她所描写的是七八十年前美国社会女性的痛苦和挣扎，但作品所涵盖的深刻寓意，却极具现实意义。这或许也是《醒来的女性》在历经岁月变迁之后，依然能撼动人们的心灵并保持长久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醒来的女性》以哲人般深沉的用意，传递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幸福其实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需要我们用心体会去唤醒它们。对于女性来说，更应该用自己细腻的心思，去揣摩那些点滴的快乐，不管在婚姻、事业、家庭中历经何种不如意，都不妨像米拉一样，不迷失自我，才能抓住每一个稍纵即逝的幸福。

“醒了”的米拉，让人看到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女性形象。在早已实现男女平等的今天，赏读《醒来的女性》，虽然国情不同，但美好的期许是一样的，那就是期望更多的“米拉”能运用自身的智慧，在家庭、事业、婚姻的多重关系中，既不轻易放弃自我，又能在求同存异中找到合理的平衡，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亦能在展现真我中去畅享人生的惬意和欢愉。

以文化之思展时代峥嵘

——评龚曙光《一个经济人的文学观察》

■刘昌宇

龚曙光是文学评论家、出版人，他的新著《一个经济人的文学观察》以访谈方式，记录了2011年12月至2017年5月间与张炜、王跃文等7位当代作家、学者展开的一场场文学对话。在一问一答的双向互动中，既道出他们对“文学和时代”这一主题的独特思考，也从文化追思的角度，构造了一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时代峥嵘图。

龚曙光经历过多重身份的转换，大学教授、省文联评论家、酒店老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但他骨子里依然有着很深的文化情结。因此，这些对话，也是一个“经济人”在事业转型路上的一次文化皈依。

谈笑风生中，龚曙光与7位受访者围绕着文学和社会、文化与时代等诸多形而上的话题，展开面对面的思维触碰。这一系列访谈，针对受访者的一些重要作品精心设题，还紧密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一些社会现象、文化热点进行深度畅叙。读者从中不仅能较为准确地了解受访者对自己重要作品的精辟解读，还能从



《一个经济人的文学观察》

龚曙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双方旁征博引的问答中，管中窥豹地体察到他们丰盈而多姿的精神世界。

在书中，龚曙光是采访者，也是满怀文学热情和人文关怀的文化探求者。他并未满足于受访者对自身作品的内在开掘，还以一个导引者的姿态，适时地把访谈的题旨与受访者的学识、兴趣、素养等相结合，使得这一场场精神

交流既有作家、学者个性化的答疑与解惑，也不乏龚曙光感觉某一话题意犹未尽而进行的补充与完善。于是，读者在他们一问一答的交锋中，进一步意识到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学的冲击，认识到互联网时代网络在繁荣文艺创作上的独特功用，并从这些前瞻性的对话中，认真审视我们在文化传播上应该努力的方向……

这些相得益彰的访谈，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让我们感动于张炜在商业冲击下对文学事业的坚守，钦佩于王跃文作为一个文化人对宿命和物欲裹挟的抗争，体会到韩少功对文化生态与精神重构的执著，感悟到李修文对人民至上和壮丽山河的挚爱，惊叹于残雪对先锋文学执念般的精神再造。

龚曙光以一个文化寻踪者的身份，将这些闪耀着思想华光的智慧琼浆，通过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打磨，悉心集结成文，让受访者深邃的才思和文学造诣，以及对当今时代和社会的热切关注，都在一场场文化探求和精神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呈现。